

中国

文化语言学 引论

游汝杰 著

ZHONG GUO

WENHUA YUYANXUE YINLUN



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

游汝杰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京)112号

内 容 简 介

中国文化语言学是近年兴起的一门新的边缘学科,其主要角度是从语言现象研究文化,也从文化背景研究语言。本书讨论了过去语言学家很少去深究、而文化学家又因缺少语言学专门知识而未能深究的一些问题,例如方言、“语言化石”以及各种专门语汇中体现的文化内涵,汉语的节律、声调对旧体诗词、地方戏曲、民间音乐的影响和制约,汉语对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某些限定等等,这些都是饶有兴味并能引人思考的,值得对文学、哲学、历史、戏曲、文化学、语言学等有兴趣的各界人士一读,也可作为大学有关专业的选修课教材。

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

游汝杰 著

*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科技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875 字数 150 000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1 792

ISBN 7-04-003585-5/H·409

定价 3.55 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人文生态环境	1
第二节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性质和目标	3
第三节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方法	8
第四节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源流	10
第五节 文化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	11
第六节 文化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以及描写语言学的关系	13
第二章 语言演变的文化背景	16
第一节 语言和文化共生、共存	16
第二节 原始共同语的拟测和共同文化特征的追寻	18
第三节 方言的历史层次和文化浪潮的遗迹	24
第四节 现代方言区划与历史人文地理	33
第五节 语言微观演化的社会、文化原因	37
第三章 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	43
第一节 语言同化和语言化石	44
第二节 语言的借用	49
第三节 语言的杂交	62
第四节 双语现象和双言现象	69
第四章 造词法和传统文化	72
第一节 亲属称谓的文化背景	72
第二节 若干构词法和传统观念	78
第三节 词源的追溯和文化史研究	80
第五章 人名、地名的文化内涵	86
第一节 人名的民族文化特征	86

第二节	人名的地方文化特征	88
第三节	人名的时代特征	90
第四节	汉人命名的语言学问题	92
第五节	地名的区域特征和语言层次	94
第六节	地名的演变	98
第七节	地名和古文化	101
第八节	地名和语言研究	105
第九节	地名和人名在构词法上的差异	110
第六章	汉语和中国文学、戏曲	113
第一节	语言和文学的深层关系	113
第二节	语言的节律和文学的节律	115
第三节	汉语的特点和旧体诗词的形式	118
第四节	地方戏曲的语言问题	121
第七章	汉语和中国传统音乐	127
第一节	语言和音乐的一般关系	127
第二节	字调和声乐作品旋律升降的关系	136
第三节	古代乐谱和古声调的拟测	140
第八章	语言和民俗	147
第一节	语言和民俗的一般关系	147
第二节	方言与民歌歌词	150
第三节	秘密语	152
第四节	语言巫术、语言禁忌、语言迷信	160
第五节	方言地理和戏曲地理	165
第九章	餘论	167
第一节	汉语和汉字文化	167
第二节	西洋传教士和汉语方言学	173
第三节	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和若干汉语语法特点	177
后记		183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 人文生态环境

中国文化语言学是近年来诞生的新学科。

任何学科의 正式诞生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对研究的对象有过某些直接或间接的观察与研究，也就是说已经有了初步认识。二是必要的人文生态环境，即学术上的需要或社会上的需要。例如社会语言学的人文生态环境，是许多人对语言学界只追求纯形式的研究和完全脱离社会的研究感到不满和失望。有了这两个条件，再加上几个开拓者的努力，新学科就会象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一样，自然而然地诞生。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人文生态环境又是什么呢？那就是人们对中国语言学的所谓危机感和摆脱“危机”的责任感。

本世纪初开始形成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几乎是全盘接受了西方语言学，特别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学术思想。其结果是利弊参半，就其有利的一面看，积累了大量用音标记录下来的语言材料，并且促使中国语言学现代化；就其弊端来看，由此产生下述两大后果：

第一，结构主义只注重描写语言的形式、分析语言内部结构的指导思想，不但割断了语言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联系，并且使语言学应有的实用或应用的价值大为降低。中国传统的小学，就其通经致用的初衷来说，其价值远远胜过现代舶来的语言学。小学能够助人读古书、写古文，但是现行的语法，对于读古文或写今文作用甚微。在 50 年代，人们曾期望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能大大促

进普通话的推广工作,但是现在看来,它的作用远不如原来想象的那么大。倒还是利玛窦的《西儒耳目资》以来的汉字拼音化运动,对普通话的教学工作有些助益。虽然今天的语言学常常自诩是“一门领先的科学”,但是国内知识界的普遍感觉是,现代的语言学是不知用处何在的可有可无的冷门学科。而在高等学府里,语言学“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境遇也已司空见惯。

第二,西方的语言学是建立在印欧语研究的基础上,而汉语跟印欧语大不相同。汉语的特点是单音节语素,在句法中语素的独立性较强;印欧语的特点是词的形态变化,词在句法中独立性较弱。以语法研究为重心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从马建忠《马氏文通》比附拉丁葛朗玛,到王力参照叶斯柏森“词三品”说,到现行的种种语法论著,大多只是移入西方的理论、术语、概念和方法,不少地方难免削足适履或是方枘圆凿,格格不入。虽然文法革新派早已看出“照抄照搬”的弊病,但是积重难返,汉语语法学在因袭的重负下,至今依然是步履维艰,异见歧出。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语法学的困惑”,而且在语言学别的领域也有类似的困惑。

由于上述两大弊端的发展,中国现代语言学越来越萎缩,而不是繁荣;语言学家越来越躲进象牙之塔,而不是走向广阔的天地。在 50 年代,现代汉语的语音学、语法学、修辞学和描写方言学,由于适应当时的人文生态环境,曾经有过它们的黄金时代。今天的语言学只有加以革新,才能适应变化了的人文生态环境,才能摆脱自身的困境,才能自立于人文科学之林。

革新语言学似乎可以从下述三方面着手。第一,把语言学从象牙之塔中解放出来,既在社会生活的背景中研究语言,也研究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并且不仅仅停留在“研究”上,还要使语言学在社会生活中起到应有的作用。第二,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考察中国语言的特点,从而建立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语言事实的理论。第三,把语言学和别的学科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彻底改变语言学“不食人间烟火”的现状。近年来,关于把语言学和自然科学结

合起来,已经讲得很多,但是把语言学和别的人文学科结合起来却完全被忽视了。上述第一方面大致相当于社会语言学的内容,我们构想中的文化语言学的内容则大致包含在第二、三方面中。

第二节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性质和目标

文化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如果把语言学分成解释性的和描写性的两大类的话,那么文化语言学是解释性的语言学的的一个分支,它与心理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处于同一个层次上,而不与描写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实验语音学等处于同一个层次上。

人类语言的性质是多方面的,所以必须从多角度研究,才能全面地把握它的性质。文化语言学只研究语言的文化内涵,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它不把研究语言的生理性质、物理性质、符号性质等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中国文化语言学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考察中国的语言和方言。在宏观上结合文化背景研究语言和方言生成、分化和融合的过程;在微观上从文化背景出发,寻找某一种语言或方言的各方面特点形成的原因。这样,我们就把语言学和文化史研究结合起来,把语言学 and 人文历史、人文地理、文学、戏剧、音乐、民俗等结合起来,既利用这些学科的知识来解决语言学自身的问题,也利用语言学的知识去解决这些学科的有关问题。

如果说文化是人类在历史上的积极创造,那么语言就是原始人类最重要的创造。语言的诞生使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发生剧变,是人类成为万物之灵的关键。语言是人类世代积累起来的极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是文化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这是显而易见的。

自然现象一般说来只有共性,而没有民族的个性。文化现象虽然也有共性,但是更重要的是民族的或区域的个性。例如化学

反应中西一律，但是绘画风格中西迥异。因此研究自然现象的学科四海咸宜，但是研究文化现象的学科却不能强求一律。我们说语言有民族性或个性，并不否认人类的语言有共性，并不反对在寻异的基础上，在更高的层次上求同。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任务是研究中国语言，特别是汉语，并不以研究人类语言的共性为己任。但是由于汉语是人类语言之一种，所以我们在研究汉语的时候当然也有可能发现人类语言的共性。例如研究汉语的字调和乐调的关系，有可能为人类的语言和音乐的关系的共性，提供证据。我们所反对的只是把现成的西方语言学理论，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语言的共性。因为西方的语言学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的文化（包括哲学）及其语言的基础之上的，所以需要考虑西方的理论有哪些是适合汉语研究的，哪些不适合，哪些适合的程度有限。下面举两个例子：

上海方言形容词的程度表达法有两种，一是词汇表达法，二是变式表达法。变式表达法又有后加法、前加法和扩展法三种。例如形容词“硬”，后加法是“硬绷绷”（程度较弱）；前加法是“绷绷硬”（程度较强）；扩展法是“石骨铁硬”（程度最强）。变式表达法的语法范畴貌似英语形容词的“级”（degree），但是英语形容词的“级”有形态变化，规律性很强，吴方言形容词的程度表达法并不如此：第一，只有一部分形容词有前加、后加和扩展形式，并且每一种形容词变化的类型也有限制，大多只能跟其中的一二种类型匹配；第二，每一种变化类型所适用的形容词也很有限，如“绷绷”只适用于“硬”，“簇”或“簇簇”只适用于“新”。吴语形容词的程度表达法，并不象英语形容词那样，能够类型化，从而归纳出较整齐的规则。所以英语的“级”这个语法范畴，完全不适合吴方言研究。

欧洲 19 世纪盛极一时的历史比较法，为原始印欧语的拟测和系属归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西方，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也因此得以确立。历史比较法早就被引进用于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但是至今收效甚微。究其原因，除了从事的人较少、记录的材料不足

等之外，还得从根本上重新考虑历史比较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汉藏语系。

我们认为历史比较法不大适用于汉藏语系，理由如下。

第一，古代汉藏人的文化背景和印欧人不同。历史比较法是建立在原始印欧人大规模集体迁徙这一文化背景的基础上的，亦即建立在语言的谱系树分化的假说的基础上。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人口迁移是蔓延式的，不象欧洲的畜牧社会常常需要大规模的长途迁徙，所以汉藏语系未必呈谱系树型分化。民族或民系的杂居、交融、接触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语言的宏观演变并不一定是印欧语言的谱系树型的。（此说参见桥本万太郎《语言类型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

第二，汉藏语的历史文献就语种、数量和年代的久远而言，都远远不及印欧语言。（见表 1.1。表中列出两大语系文字的种类及现存文献的最早年代）汉藏语系的文字种类是列举（不包括彝文、壮字、水书及清代以后创制的苗文等），印欧语系只是举例而已。

表 1.1

汉 藏 语 系		印欧语系(举例)	
甲骨文	前 14 世纪	Hittite	前 17 世纪
藏 文	9 世纪	Greek	前 8、9 世纪
西夏文	10 世纪	Pali	前 5、6 世纪
缅 文	11 世纪	Iranian	前 5、6 世纪
泰 文	13 世纪	Sanskrit	前 4 世纪
傣 文	13 世纪	Gothic	4 世纪
		Amenian	5 世纪
		Tocharian	7 世纪
		English	7 世纪
		Celtic	8 世纪
		Slavic	9 世纪

汉藏语系中的汉语甲骨文虽然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但不是表音的，西夏文也不是表音的。另四种表音的文字中，傣文的创制时

代虽然被学者们推定为 13 世纪(据罗美珍《西双版纳傣文》,载《民族语文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但是明确注明年代的最早的傣文文献,是晚至 1800 年抄刻的。所以对于构拟古代语音来说,较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实际上只有藏文、缅文、泰文三种。文献的短缺大大增加拟测工作的困难。而印欧语系的文献不仅种类多,历史久,并且同一个历史时期往往有两种以上文献可资比较,这是印欧语系历史比较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第三,历史比较的重点一是比较形态,二是比较基本词汇,以求出语音对应规律。从印欧语的立场看,语言中最稳定的因素是形态变化。汉藏语缺少形态,因此只能从基本词汇的比较入手。欧洲语言的历史比较最重视的基本词汇是数词和人称代词。古代印欧人的经济核心是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商业往来,数词的稳定性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比较数词容易获得成功。汉藏语的数词并不稳定,不少语言中的数词明显借自汉语,如泰语、壮语中,只有“一”是本族语固有的,“二”以上即借自汉语。其他所谓“基本词汇”也并不怎么稳定,往往很难辨别同源词和借用词。这又给比较工作带来困难。

第四,印欧语中每一个词常常至少有两个或三个音节,又有形态变化,因此确立同源关系和语音对应关系较为可行、可靠。汉藏语的语素多是单音节的,且无形态变化,音韵结构又普遍较简单,音韵面貌的相似或“对应”难免带有偶然性,所以往往很难严格地作出同源关系的证明。所以 A·Meillet 说:“对于这些语言,如果要想得到一些真正的证明,就非另找一个新方法不可。”(《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第 34 页,科学出版社,1957 年。)

鉴于上述原因,印欧语系的历史比较法很难完全搬来研究汉藏语系。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也许只能在较低的层次上进行,如构拟一个方言、一个语言或一个语族的原始语,至少在现阶段只能如此。笔者认为,从中国古代文化背景出发,汉藏语系的历史语言学应充分注意研究语言的借用、杂交、底层、类型演变等问题。

上述两个例子说明中国语言学不能全盘西化，下面举例说明中国文化背景对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

方言地理是一种人文现象，研究方言地理学必须考虑它的文化背景。汉语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跟中国文化的固有特点关系很大。研究汉语方言地理的人不难发现：旧府州辖境内的方言内部有很大的一致性。这样的例子各地都可以找到，如浙江的温州府、江苏的徐州府、上海的松江府，其方言的内部一致性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从中国文化的特点来考察，这种现象是很容易理解的。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自古以来就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历代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承平时代一般百姓都安居乐业，厮守田庐，乡土和宗族观念很强，除非有战祸和天灾的威胁，都视背井离乡为畏途。另一方面，我国自秦代开始就实行地方行政管理制，其历史之悠久、区划之严密、管理之有效，为世所罕见。旧府（或州）是一群县的有机组合体，府治即是一府的文化中心。在农业经济社会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大都不超出本府之外。上述两方面的文化背景自然使得一府之内的方言趋向一致，因此历史行政地理还可以作为拟测古代汉语方言区划的重要线索。此外，在给现代汉语方言分区的时候，也可以把历史行政地理列为重要的参考项，在府境长期稳定的地区尤其应该如此。笔者曾发现宋代的行政区划和现代方言区划，事实上有不少重合之处。

从中国文化背景出发研究语言和方言，建立不同于西方的理论，实际上还有不少领域有待开发或进一步开发，例如中国文化的固有特点和汉语语法特点的关系、中国古代逻辑特点和汉语语法特点的关系、底层文化和底层语言的关系、地方文化和人名地名的关系等，至于婚姻制度和亲属称谓、文化交流和外来词、民间心理和忌讳造词法等则是过去已经研究较多的领域。中国文化语言学将大大拓展语言研究的视野，使语言学摆脱与其他人文科学和社会生活隔绝的现状，成为一门可以与国内别的人文学科相争雄的有用的学科。

第三节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方法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方法是学科交叉研究，一方面把多种人文学科引进语言学，另一方面也把语言学引进别的人文学科。

中国文化语言学是解释性的语言学，凡解释性学科都必须利用多种学科的知识，来研究和解释所谓“本体”。中国文化语言学提请人们注意研究语言的人文因素和文化内涵。它认为语言不仅是一种纯形式的符号系统，而且是文化代码，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如果语言学只研究语言的形式或内部结构，那么就不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语言的本质，要解开语言之谜还必须要有别的多种人文科学参与。

人文科学对语言研究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方面人们已经注意到的只是人文历史对于解释语言现象的作用。即使是在这方面，某些描写语言或方言的著作，也只是在头上戴上一顶人文历史的帽子，实际上这些人文历史的材料和语言材料往往如油水分离，未能有机结合。除了人文历史之外，哲学、逻辑学、文艺学、地名学、民俗学、文字学等多种人文科学都有助于语言研究。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目标之一就是利用这些学科的知识，解决语言学自身的问题。

从结构主义的立场来看，只能就语言本身来研究语言。但语言学上的有些问题，光凭语言内部材料，很难加以解决。但是如果利用语言以外的材料和语言学以外的知识，则不难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下面举一个例子：

对古代汉语语音的研究，在声母和韵母方面都已取得可观的成绩，但是在古声调的构拟方面，却普遍认为困难很大。笔者曾利用音乐学知识，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印欧语言是以轻重音作为超音段的主要特征的，轻重音能够辨义，所以西方的诗歌和声

乐作品的节奏和旋律是以强弱拍相间为基础的。汉语超音段的主要特征是声调。汉语有声调的特点对于旧体诗词和声乐作品的节奏和旋律有着明显的影响。事实上，中国的声乐作品是以字音的声调为基础的，这种现象从地方戏曲、旧体诗词的吟诵调和各地民歌都可以观察到。这样看来，只要找到古代配词的声乐作品，我们就可以从它的乐曲的上下行的趋势，来研究古代声调的调型。本书第八章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上述情况说明，我们可以利用别的人文科学的知识来解决语言学的有关问题，同时语言学在解决邻近学科的有关问题上也可以大显身手。

我们可以看到，某些哲学、戏曲史、小说史、科技史、民俗学、民族学、地名学等领域的论著，常常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解决各自的问题，但由于没有语言学家的参与，这些研究往往发生错误或无法深入。例如近年来《金瓶梅》的方言系统和作者籍贯问题，重新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参加讨论的学者都试图寻找作品中见于今天某地的方言词汇，据以判断作者的籍贯。结果各执一端，异见歧出。从语言学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研究方法至少忽略了下列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有的词汇在两地的语音形式不同，但是词源是相同的；二是现代某地的词汇不等于明代某地的词汇，事实上一种方言中的词汇总是处于不断消长一替兴的过程中；三是方言中的词汇是开放性的，容易互借，不象语音系统和句法结构，那是封闭的，不易互借。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大多缺乏说服力，并且往往互相矛盾。

下面提供一个利用语言学知识解决戏曲史问题的实例：

《白兔记》是元末明初的四大传奇之一。四大传奇中只有《白兔记》的作者没有查明，这在戏曲史上是一个悬案。1967年发现明代成化年间刊刻的《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这是现存最早的传奇刻本。成化本的前场对白中有一段文字说明这个演出本的编者是“永嘉书会才人”。“永嘉”即浙江温州，这条线索似乎告诉我

们编者是温州人，但是经过笔者初步研究，结论并非如此。因为成化本中有许多别字，如将“常熟县”写作“长熟县”，而写这类别字的客观原因自然是别字和正字在作者的方言里，音同或音近。所以比较分析别字和正字的音韵结构，可以推断作者的方言系统的某些特点，进而断定作品的方言系统和作者籍贯。笔者曾将《白兔记》中全部别字加以归纳，分成六类。结果发现每一类“音近而误”的别字跟与之相应的正字，在北部吴语中都是音同或音近的，在南部的温州方言中两者的读音却大相径庭。又通过跟冯梦龙《山歌》等同时代吴语材料的比较，最后得出结论：成化本的编者决不是温州人，其籍贯当在今苏南一带。正如我们今天不能武断某位“北京作协”成员一定是北京人一样，我们也不能武断这位“永嘉书会才人”是温州人，因为“永嘉书会”的成员不见得都是本地人，也可以有外地艺人。

第四节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源流

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早在 19 世纪上半叶就开始了。德国语言学家洪堡德(W·V·Humboldt, 1767—1835)在著名的论文《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论爪哇岛上的卡维语》绪言，长达 350 页)中首次讨论了语言结构和人类精神的关系。到了本世纪初，美国的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鲍阿斯(F·Boas)和他的两个学生克鲁伯(A·L·Kroeber)、萨丕尔(E·Sapir)，以及萨丕尔的学生沃尔夫(B·L·Whorf)致力于调查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和文化，创立了人类学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在欧洲，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于 1914 年到西太平洋特罗布赖恩特(Trobriand)群岛调查当地的语言与文化。在上述学者之后，西方继续有人利用人类语言学的方法，分析诸如亲属结构之类问题。近年来则有人采用生成语法的某些概念来分析宗教仪式或别的人类文化行为。

虽然从汉代到清代,在大量经籍注疏中早就有许多研究词义和古代文化关系的内容,但是最早有意识地试图把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学者,是一些西方的汉学家,如法国的葛兰言(M·Granet)、马伯乐(H·Maspero),美国的劳费尔(B·Laufer),他们在本世纪初曾有多种有关论著发表。法国汉学家的研究重点是汉语和汉人思想、逻辑的关系,试图拿汉语的特点证明汉人心智的特殊性;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篇》收集、排比了许多有关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流的材料,材料丰富,时有创获,但不成系统,缺乏理论。

在30年代,中国的一些民族学家也已开始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实地调查,罗香林、刘锡蕃、徐松石三人先后都有重要的著作发表。特别是徐松石的《泰族壮族粤族考》(中华书局,1936)和《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1939年),材料丰富,创见甚多,其中也涉及到语言学的内容。但这两本书的缺点是:所提供的语言材料不够准确,全书也欠精审。同类的民族学著作也有类似缺点。

30年代末至50年代,国内许多语言学工作者曾在西南地区大规模调查研究少数民族的语言和社会,但是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著作还是很少。罗常培先生曾著《语言与文化》一书(1950年北京大学出版),遗憾的是,这本书并没有引起语言学界足够的注意和广泛的兴趣。虽然这本书还有缺陷:篇幅不算太长(正文共108页),而内容兼赅古今中外,似未深入展开,但是这本书仍不失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

第五节 文化语言学与社会科学语言学

转换生成语法的旨趣是研究拟想的人(an idealized man)怎样用有限的规则生成无限的句子,着重点是语言能力(competence);社会语言学的旨趣是研究社会的人(a social man)跟别人

交际的时候怎样使用语言，着重点是语言运用(performance)；文化语言学的旨趣是研究同一个文化圈的人(cultural men)的语言跟文化背景的关系，着重点是语言的背景(background)。

美国的拉波夫(William Labov)在60年代所倡导的社会语言学，对于当时追求纯形式研究的语言学是一个重大的革新。它的宗旨是在语言集团的社会环境中，在共时的平面上研究语言运用的规则和演变，试图建立能够解释这些规则和演变的语言学理论，例如研究纽约百货公司中r音的社会分层、黑人英语的语法特点等。

在拉波夫以后，社会语言学还研究语言与社会归属、语言与种族偏见、语言与社会改革、双语现象和双语教学等问题。

笔者认为，文化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至少有三点重大的不同之处：

第一，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语言使用的规则，即人们在社会交际中如何使用语言，例如一个说英语的儿童，在不同的场合选用不同的词汇，称呼自己的父亲：father、daddy、pappa等。文化语言学的重点是从文化背景出发，来解释某一种语言或方言的自身特点(包括宏观的和微观的)及其使用特点，例如汉语语法特点不同于印欧语系，这跟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有什么关系；又例如，上海方言的年龄分层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而文化语言学则要研究它的文化背景。

第二，社会语言学只研究当代的语言现象，文化语言学也研究历史上的语言现象。语言或方言在历史上的每一种宏观变化和部分微观变化都可以从文化史上得到解释，例如吴语区中杭州方言岛的形成、上海方言中人称代词的变化等。

第三，社会语言学并不试图利用语言学知识研究别的人文科学，也不试图借助多种人文科学来帮助解决语言学问题。文化语言学试图把语言学 and 别的人文科学结合起来，既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又用语言学知识帮助解决邻近学科的有关问题。